

## 自序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史料彙編》這部史料選集，所蒐集的是關於「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1948，10，1—1979，3，16）的各項第一手史料，在這部史料選集付梓之際，我願對這部書編輯的緣起及其取材範圍與原則略作說明。

戰後四十多年來台灣地區社會文化的變遷，是所謂「台灣經驗」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部份。戰後台灣的社會結構從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裡轉化為一個以工商業為主的社會。經濟發展則從光復初期的管制經濟，經由五〇年代初期以降的計劃經濟，到现在的自由市場經濟。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也帶來文化的鉅變。今日台灣的文化生活百病叢生，滿目瘡痍，舊的價值系統早已日薄崦嵫，而新的文化則尚未建立，在滔滔世情之中，民生多艱，百草不芳，闇昧惑亂，載浮載沉。在中國文化史上，這是很令人驚心動魄的一章。戰後台灣四十多年來歷史巨變，其原因固然不止一端，其影響亦至為複雜，未可一概而論，但是對這一段「台灣經驗」的觀察，則必自戰後台灣的土地改革、農業發展以及農村變貌始。

不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戰後台灣的農業、農村和農民，所走過的歷史軌跡，都與「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的政策設計與計劃推動，具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農復會三十年的歷史，正是思考戰後台灣史的重要策略點之一。所以，近十年來，我平日讀書，頗有心於農復會相關史料之蒐集，上至正式的官方文書《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工作報告》，下至私人函牘、未刊公文檔案、私人回憶錄，皆在蒐羅之列。數年以還，銖積黍累，所蒐集的史料已頗為可觀。於是，最近兩年來乃進一步以農

復會歷史為主題，對農復會諸前輩及工作人員，有系統地進行口述歷史訪問工作，整理了十餘萬字的口述歷史訪問記錄，以補文獻資料之不足，庶幾官私兼顧，文獻並觀，通識大體而不遺錙銖。

接著，我想就編集這部史料選集的過程中，從龐雜的史料中抉擇史料時，所依據的三項基本原則，略作說明：

第一是代表性原則：現代史資料浩如煙海，選擇史料如在滄海中求其一瓢，必須取其在歷史發展中具有代表性意義者。本書從三十年來所出版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工作報告》中，選取史料，多半本此原則，取其在戰後台灣農業史中具有代表意義的資料，庶幾以小窺大，從點滴觀潮流也。

第二是重要性原則：本書收錄近兩年來編者對農復會人員所做之口述歷史訪問記錄，即本乎此一原則。農復會成立於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正是近代中國歷史風狂雨驟的時段，不到一年農復會就隨著歷史變局而播遷台灣，三十年來台灣農業史的許多重大事件，現存官方文字資料未必能窮其原委，所以，以口述歷史訪問記錄加以補充，亦所以為國家存文獻之意也。在這一批口述歷史資料中，張憲秋先生及謝森中先生的部份，尤為精詳，特具價值，從他們的口述歷史記錄中獲益者當不止編者一人而已。

第三是珍貴性原則：在編者蒐集資料過程中，無意間發現幾件史料，彌足珍貴，頗具價值，皆原件收錄，以備有心於這一段農史者之參考。其中較為珍貴的是農復會第一任美籍委員貝克 (John Earl Baker, 1948-1952 在任) 寫給他兒子的家書，打字原稿長達三十餘頁，曾刊於 *Chinese-American Economic Cooperation*, January 1952, Vol.1, No.1, 這份刊物是戰後初期的油印刊物，印刷份數不多，數十年後的今日存世尤少 (似僅台北的農委會圖書館及美國國會圖書館各收藏部份卷

期)，這件家書敘述農復會創辦時在大陸及遷台初期史事，極具參考價值。另外，光復初期農復會派員組團來台灣調查台灣農會所完成但未公開刊印的若干報告，以及胡適之先生與沈宗瀚先生，為促成台大與加州大學農學院的合作，而寫的幾封信，亦具有史料價值，皆一併收入。

在這部史料選集編集期間，我得到許多前輩和朋友的協助與支持，其中蔣彥士先生、謝森中先生、傅安明先生的協助，對我的研究工作助益最大。張憲秋先生遠居北美，針對我所提出的口述歷史問題，不辭辛勞一一筆答。李登輝先生、李國鼎先生、馬保之先生、楊繼曾先生、邱茂英先生、陳人龍先生、歐世璜先生、王友釗先生、朱海帆先生、李崇道先生、畢林士先生（Bruce H. Billings）、張訓舜先生等參與農復會工作的前輩，接受我的口述歷史訪問，為這一段歷史留下最珍貴的史料，我衷心感謝。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提供經費，使資料蒐集工作得以順利展開，張秀霞小姐協助打字及校對工作，均此敬申謝意。

「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楚辭·離騷》），「盈天地間皆史料也」，史學工作者蒐集史料，誠如秋風之掃落葉，求備不易，抉擇尤難。本書率爾刊佈，實本乎為桑梓存文獻之微意，敬盼學界及農界先進君子，憫其意而匡其所不逮，片言隻語之教示，皆我師也。

黃俊傑 謹序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於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